

抗战烽火中的 中华交响乐团

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重庆,各地音乐家、音乐团体也纷纷迁渝,战时重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一个新的音乐之都。在此基础上,为加强音乐界自身的力量与团结,适应不断发展的抗战新形势并满足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需要,大批重要的音乐团体、音乐组织,如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山城合唱团、南国音乐社、中国音乐学会等纷纷在重庆成立。其中,“中华交响乐团”便是在战火纷飞中诞生于重庆的一个影响广泛的音乐团体,也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首次冠以“中华”之名的交响乐团。

中华交响乐团,筹组于1940年春。该年4月14日,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立法院院长的孙科等政界要人分别以中美文化协会会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约集当时齐聚重庆的一大批文化团体,诸如中美文化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法比瑞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励志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等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共同商议发起组织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事宜。孔、孙二院长认为:抗战以来,随着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各友邦人士对我国的认识也与时俱进。我国在抗战期间文化艺术的发展进步,尤为友邦人士所注意,特别是一个月前我国的对美对苏两次音乐广播,极获美苏人士的赞誉。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一完备组织与训练有素的交响乐团。因此,为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并补此方面的不足,特发起组织中华交响乐团。经过与会代表的广泛讨论与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为推动音乐的大众化及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中华交响乐团有迅速

章程,决议除发起人孔祥熙、孙科、陈立夫、王世杰、朱家骅、罗家伦、杭立武、邵力子、陈铭枢、董显光、黄仁霖为当然名誉理事外,还决定敦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政治部部长陈诚、内政部部长周钟岳、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张伯苓及大主教于斌等为该团名誉理事,并互推孔祥熙为名誉理事长,孙科为理事长,司徒德为总干事,马思聪为指挥,王人艺等50名著名音乐家为团员。15日该团举行第二次理事会议,除决定该团于6月6日正式成立并加推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为该团名誉理事外,还对该团成立后最初三个月的工作计划作了安排,主要是定时举行音乐演奏大会,普遍招待各党政机关长官、外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及文化界、新闻界、音乐界、妇女界代表、劳动界店员、小学教员、学生、难童等等,并不时举行对外音乐演奏会,以促进中外音乐的交流,同时积极推动音乐的大众化与普及性工作。

□唐润明

成立的可能与必要,并当场推定孔祥熙、孙科、王世杰(中英文化协会会长)、朱家骅(中德文化协会会长)、毛庆祥(中法比瑞文化协会负责人)、黄仁霖(励志社总干事)、杭立武(中缅文化协会副会长)、陈铭枢(国民外交协会会长)、邵力子(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会长)、董显光(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等为发起人,并延聘在当时即已享誉全国的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吴伯超为该团业务指导,积极筹备,以便于最短期内正式成立。

5月3日,筹组中的“中华交响乐团”举行首次理事会成立仪式,出席者有孙科、杭立武、黄仁霖等发起人及其他各界人士数十人。会议在孙科主持下,讨论通过了该团

1940年6月6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正式在重庆宣告成立。6月8日,该团部分团员携带乐器,赶赴战时重庆经常召开盛大集会的嘉陵宾馆举行其成立后的首次演奏会——成立典礼演奏会。出席会议的,除该团主要领袖孔祥熙、孙科外,还有战时首都各机关负责人陈铭枢、张维翰、董显光、萧同兹等及新闻界代表200余人莅会,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等也兴致勃勃到会聆听战时中国的第一场交响乐演奏。自此,山城重庆首次奏响了世界交响音乐大师们的华彩乐章。

中华交响乐团团址初在重庆市中区五四路江家巷7号。但6月份正是重庆雾季之后,日机频繁空袭重庆的开始。是月的11、12、16、

17、24、25、27、29日,日机动辄数十架乃至百余架地空袭重庆市市区,使得重庆市遭受巨大损失,位于五四路的中华交响乐团因此也同样遭到重大破坏。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该团同仁与英勇的重庆市民一道,并不为日军的暴行所吓倒。7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在市区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篮球场草坪上举行了该团成立后的首次对外公演——“七七前夕演奏大会”,以此作为对中国抗日战争三周年的纪念。是日到会的各界人士十分踊跃,报刊报道谓多达3万余人。整个会场以火炬代替电力,显得尤为庄严肃穆和众志成城,在演奏了众多世界名曲之后,该团最后演奏的结束曲是聂耳名作《义勇军进行曲》,全体听众在音乐的伴奏下齐声高唱、鼓掌击拍,充分显示了战时首都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嗣后不久,为避免日机空袭,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及顺利开展工作,该团遵从政府当局有关疏散的指示,于1940年9月4日从市区原址全部迁到了江北观音桥新村。

二

中华交响乐团最初系一些社会名流及部分音乐同人邀约成立的一个民间乐团,成立后,曾根据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多次不同规模的演出,如1940年8月8日晚在该团演奏厅举行演奏会,欢送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西南支部的工作人员赴前方工作;8月13日,该团又在中央公园举行公开表演,除演奏了莫扎特的《开场曲》、西班牙的《火舞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外,还有《我的祖国》、《塞外舞曲》、《回旋曲》、《狂想曲》,同时穿插有著名歌唱家吴树樾先生独唱的《八·一三纪念歌》、《满江红》、《自由的号角》等;11月9日,该团又假嘉陵宾馆举行我国音乐界的首次俄罗斯名曲演奏,节目除了马思聪的《弦乐四重

奏》及《我的祖国》、《荒山之夜》外,还演奏了俄国作曲家包罗亭作的《第二交响乐》,此乃我国音乐界正式演奏俄国作曲家作品之始。所有这些演出,都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但该团仍认为这样的零星演出,既未充分发挥该团固有优势,又不利于形成规模,扩大影响。因此,孙科以该团理事长的身份,于1940年11月25日致函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称:“敝团兹为供给市民高尚娱乐及藉雄壮歌声提高大众抗敌情绪,以辅助抗建宣传起见,拟于每月在国泰戏院担任公开音乐演奏会一次,由贵府主持,请商转该院指定每月拨出一场,俾举行演奏。”重庆市政府接函后,认为该团此举“用意至善,应表赞同”。遂责成市社会局办理并回复。市社会局经与国泰大戏院等影剧院商量后,本着各娱乐场所公平分尽义务的原则,于12月9日复函交响乐团,“指定国泰戏院、实验剧院、民众影院、一园剧院及将落成之唯一影院、新川影院等六家,按月轮流,各拨一场,作为贵团演奏场所。”同时会飭上述各影剧院“知照办理”。此后,中华交响乐团即分别在重庆的各大娱乐场所作或公开、或招待性的演出。这些演出的绝大部分是配合当时各界(特别是文化界、音乐界)举办的重大活动而为,同时也有为献机、劳军等爱国行动募集资金的演出。

1942年10月,民间的中华交响乐团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正式改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了国立的推行乐教机关。改隶之后,孔祥熙仍以其权威继任该团的名誉理事长,司徒德升任团长,马思聪仍被聘为该团指挥;同时改订该团的工作计划为:“募集创作奖金十万元,与国立歌剧学校及戏剧界人士联合发起中国新歌剧促进会,请有关当局设置音乐器材制造研究班,赞助业余音乐家,组织业余乐队”等等。该团改隶后的第一次盛大活动是在1942年11月9日假中苏

文化协会举行的音乐茶会,以此欢迎自香港脱险归国抵渝的我国著名声学家马国霖先生、钢琴家林声翕先生及舞蹈家戴爱莲女士以及其他业余音乐爱好者。此后,该团又于12月底举行纪念音乐会,以纪念著名作曲家、曾任该团指挥的郑志声教授逝世一周年,同时为郑氏子女筹募教养基金。

1942年6月3日,为纪念该团成立二周年,该团假嘉陵宾馆举行盛大音乐演奏会,出席者有宋庆龄、孙科、孔祥熙及各驻华大使馆大使、英美驻华军事代表团成员等中外来宾300余人。此次演奏大会由王人艺、黎国荃分任指挥,王人艺以小提琴演奏了韦伯的《自由射手曲》、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全部三乐章)、《英雄交响曲》(全部四乐章)。其中,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四乐章,系在中国更是在重庆第一次全部演奏完毕,被时人誉为“以雄伟始,以沉穆继,以欢跃终。”而由陈振铎表演的二胡独奏,更是“将中国音乐之特点,表现至最高度”。中共中央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在谈及此次演出的整体水平时,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此次演奏节目之充实,演奏技巧之完整,可谓中国音乐史上光辉之页。”

为了更进一步地发挥音乐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达到该团积极推行礼乐,加强民众音乐教育的办团初衷,扩大音乐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与号召力,自1943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起,中华交响乐团决定举行星期音乐会。每逢星期日,皆择地举行一场高质量、高水平的交响乐演奏会,其曲目多为久传于世的世界名曲,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交响曲》,韦伯的《自由射手曲》,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魔笛序曲》,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以及世界著名歌剧《浮士德》、《茶花女》、《霍夫曼之故事》、《卡门》中的选曲。每次的演出,都以其精彩的曲目吸引了大量

的听众,特别是5月15日晚在上清寺求精中学广场及16日晚在中央公园广场举行的两次公开演奏会,更是被成千上万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报刊曾纷纷载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的称“中华交响乐团每周所举行的星期音乐会,给了重庆的音乐爱好者一个欣赏西洋音乐的好机会”,并认为“这该是重庆市民极感欣喜的”;有的称在抗战时期过于荒芜的音乐天地里,“中华交响乐团的‘星期演奏会’,无疑是不波池水中的新的荡动”,并“希望它的波纹分散,不断地扩展开去”;有的称在抗战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欣赏到这艺苑的奇花,是难得的机会”;有的认为中华交响乐团“这样不断有计划的演奏,将会把人们简单的低浅的音乐趣味,引导锻炼成为高深的欣赏”……

三

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以来,除了致力推进国内音乐运动及提高民众欣赏音乐的水平外,还主动地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同盟诸国音乐文化界取得联络,进行积极的中外音乐交流,以求中外文化的沟通,并让世界人民听到中国抗战的真正声音。该团成立后不久,马思聪即以私人名义致函苏联苏纳埃夫斯基、克里阿、珂伐兰、米耶珂夫斯基等五位音乐名家,介绍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经过及今后的工作打算,同时希望加强中苏两国的音乐文化交流。苏联有关方面接函后,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除及时地回函马思聪外,并于1940年8月底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赠送了许多世界名曲名谱给中华交响乐团,其中包括柴可夫斯基、莫索尔斯基、贝多芬、莫扎特、卡里尼古夫等人所作的全部交响乐谱。这当中,尤以卡里尼古夫的作品最为珍贵。卡氏在帝俄时代曾被誉为最

有天才的音乐家,但生前郁郁不得志,最终穷困潦倒,忧愤而死。在他死后,其作品才被世人认识和称道。但在此之前,卡氏作品在中国无任何介绍,更谈不上不什么影响。此次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赠送的卡氏作品,是第一次进入中国,当然也是由中华交响乐团首次介绍给中国的广大听众的。

1943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又首次向中华交响乐团赠送了苏联青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于1941年在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苏联人民奋起抗战之际创作的、描写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军的史诗般的乐曲——《抗战交响曲》(也称《第七交响曲》或《列宁格勒交响曲》)。该曲目自1941年7月开始创作,1942年3月在苏联古比雪夫首演后,即在苏联各地引起巨大反响,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苏联著名作家A·托尔斯泰在聆听了该曲之后,坚定地指出:“希特勒不能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红军谱写了具有世界性胜利的庄严的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倾听祖国的心声,奏出凯旋之歌。”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也因此荣获斯大林特别奖。这以后,《抗战交响曲》又被送到欧、美、非各大洲的主要国家演出,仅美国在1942年至1943年就演出了62场之多,被誉为“反法西斯的人民斗争精神的辉煌的艺术表现”、“英雄的编年史”。但在远东,战斗中的中国则是第一个演奏该曲目的国家;而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听众,则近水楼台先得月,于1943年6月14日(即联合国日)最早聆听了这一史诗般的、激动人心的伟大乐曲。在演出的当天,著名记者徐迟就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指出:“中华交响乐团的演奏,让‘今天重庆城里响起了列宁城的歌声,这是需要一个反法西斯的勇士的性格,来歌唱反法西斯的勇士之歌的。”他

还称誉肖氏的作品“是一首抗战的交响乐,它是我们所饥求的题材”,并呼吁中国的音乐家们创作并演奏出更多的这样的好题材、好乐曲。嗣后,中华交响乐团又携带该曲,赴成都等地作旅行演出,以苏联人民抗击德军的伟大精神,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并发挥音乐在支援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也将带来的美国有关方面赠送给中华交响乐团的名曲转交该团。该团经过短时间的紧张排练,于1945年除夕之夜假中央广播大厦举行演奏会,首次演奏了这些曲目,促进了中美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除此之外,中华交响乐团还于1943年10月创办了《音乐导报》,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浅显的管弦乐常识,以配合该团的演出,提高人们欣赏高雅音乐的水平。

中华交响乐团在战时音乐界所作的种种努力与巨大贡献,赢得了当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极高评价,早在1942年4月,《新华日报》即载文指出,在中华交响乐团演奏时,“听众情绪的热烈,会场秩序的良好,都证明二年来由于各交响团的努力,一般听众对音乐的欣赏程度已经提高了。”之后,更有记者著文称:“中华交响乐团及实验管弦乐团,他们集合了几十位音乐专门人才,不倦地把西洋音乐介绍给战斗中的中华民族,实在是伟大的贡献。”“我们要夸耀我的朋友——中华交响乐团。它,只是一个音乐组织,可是演出的次数,比其他所有的音乐组织的演出次数加起来还要多。整个数量上的多,常常使我们惊异,也因而使我相信它的质的精良。”……

中华交响乐团,不愧为中国音乐界抗战史上的一面光辉旗帜!